

# 二十一世紀的通識教育

## ——以美國加州大學為例\*\*

(譯者) 黃鳳安 \*

香港中文大學

**編者按：**為推動通識教育在研究型大學的發展，美國加州大學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於2004至2006年間成立了「二十一世紀通識教育委員會」，以重申通識教育在研究型大學中之重要地位。委員會在檢視了加州大學現有的通識教育政策與實踐，並在此基礎上，為大學通識教育的發展提出了若干建議。

「二十一世紀通識教育委員會」的成員來自加州大學各校區、哈佛大學 (Harvard University)、史丹福大學 (Stanford University) 和普林斯頓大學 (Princeton University)，當中包括管理人員和大學教師，合共25人。經過兩年的調查和15次會議研討後，委員會於2007年4月發表了題為《二十一世紀的通識教育》的報告。在此報告中，委員會檢視了美國大學通識教育的歷史、制度及文化脈絡，指出研究型大學發展通識教育的局限，並提出八項建議供各大學參考。

---

\* 香港中文大學通識教育研究中心前任二級助理主任。

\*\* 本報告全文可參見：Centre for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General Educ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A Report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ommission on General Educ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http://cshe.berkeley.edu/publications/publications.php?id=254>)，瀏覽日期：2008年3月27日。本刊徵得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CSHE) 同意，節選部分章節譯為中文，謹向「二十一世紀通識教育委員會」、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及提供資助的紐約卡耐基公司 (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 和休略特基金會 (William and Flora Hewlett Foundation) 致以謝意！

香港中文大學作為一所研究型綜合大學，在推行通識教育的過程中，遭遇了與加州大學相似的困難。目前，為配合2012年大學四年制的推行，香港中文大學的通識教育課程將新增一門6學分的「一年級必修核心課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這篇報告所分析與討論的背景、問題、建議等，均對香港中文大學具有參考價值，我們相信這對華人地區的大學通識教育實踐也有借鑒意義。由是，本期《大學通識報》擇其中的重要篇章譯為中文，以饗讀者。

## 一、引言

踏入二十一世紀，通識教育面對質性上的新挑戰和變化，美國教育制度下的高等教育正從各個方面進行急速的轉變和發展。這首先表現為教育文化和制度架構的發展，有關的發展具體體現在以下數個方面：現時各種類型的院校均大力推廣「研究文化」，聯邦政府亦提供長達五十年的重點撥款，以支持大型研究項目；將大學本科教育的焦點落實在職業訓練，不少大學積極開拓工程、商業及其他技術性的專業科目，相反，修讀人文學科的學生人數卻每況愈下；許久以來，公眾對本科生應該學習的基礎知識的優次仍未能達成一致意見；學生選科有明顯的「自助餐化（cafeteriaization）」傾向。

其次，外在環境的變化對高等教育的發展也產生了深遠影響。最明顯的因素是學生背景愈來愈多樣化；在全球化過程中，社會現象、社會福利模式發生了轉變；以及政府和大眾對高等教育機構的問責形式也在變化。作為高等教育的一員，如何通過通識教育協助年輕人適應二十一世紀的環境轉變，培養他們成為有教養的公民，這些都值得我們思考。

第三種對高等教育產生影響的因素是公民參與的態度發生了轉變。當代社會出現不少民權運動和組織，它們倡議建立一個共和、多元及民主的社會。「個人是政治中一部分 (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的觀念亦漸為大眾認同。公眾對政治議題的焦點亦由國內轉到全球性範圍。因此，通識教育理應為年青人在公民參與方面作些準備。

第四種影響高等教育發展的因素來自新資訊和傳播科技所引起的教育模式轉變。科技發展一方面為教與學提供了新的良機，從而改善了學習成效，並令資訊更流通，另一方面也帶來新的挑戰和限制。

最後一種影響因素是現時跨學科課程 (interdisciplinary offering) 和通識教育課程在架構和組織上所面臨的障礙，例如：按學系劃分權力和資源、課程設計非由中央統籌、傳統的財政撥款模式，以及獎賞制度的模式等。

基於以上現況，確有必要深入探究大學通識教育的意義和推行模式，從而作出合適的建議，這種迫切性實在不容忽視。

## 二、高等教育的架構和文化

近一個世紀以來，美國的大學和學院架構一直是以學系來劃分的，例如物理系、心理學系、歷史系等。雖然近年有不少跨學科課程出現，但它們只是作為專業學系的補充，並沒有真的取締以學系劃分的整體架構。在此制度架構下，每個學系有各自的行政部門、課程結構，以及人事和財政管理模式。此外，現時各院校均瀰漫著一股「以研究成就和刊物出版為焦點」的文化，教員需要不斷在其專業範疇作研究，出版論文和刊物，並出席各類型的研討活動，這些成就和貢獻均有助教員鞏固、甚至提升自己在學系內的地位，並爭取更多資源和研究撥款。

普遍而言，大學已漸漸地下放權力予各學系去統籌自己的科目和課程，展現了絕對的「地方分權」。因此，課程發展已非校長或校董會的職責。有些學系可能會為了增加收生人數而開辦一些「大眾化」的入門課程予非主修學生，卻不太願意花功夫去籌備跨學科的基礎課程。學系主管可能會向其部門的教員施壓，要求他們專注於自己所任教的本科主修課程和研究院課程，不鼓勵他們教授其他學系或部門的科目。不少教員曾耳聞，甚至本身便認為，任教通識課程、尤其是跨學科科目遠不及在本身的學院或學系去發展其事業來得重要。基於大學的財政預算制度，學系主任一般都比通識教育主管和教員有較大的影響力。因為通識課程的撥款往往只屬臨時性質，因此，在爭取資源和撥款時，這類課程便顯得很荏弱，可謂絲毫沒有議價能力。

由此可見，現時以研究成就為尚的高等教育文化，加上學系在架構上的各自優勢，都使得通識教育處於不利形勢。教員既要滿足學系對學術成就的索求，另一邊廂又要實踐本科通識教育的理想，這種內在的張力似乎無法避免。即使如此，這並不是說問題無法得到解決，但我們並非主張廢除整套現行的高等教育架構和文化，因為這顯然是不切實際的。實際上，通識教育課程面對的最大問題是缺乏創新及持續性。我們希望藉本文引起大眾對通識教育的關注，找出需要考慮的具體因素，以便重新釐訂通識教育在高等教育所佔的位置。

### 三、將通識教育融入大學架構中

上文曾闡論過在現時的高等教育架構和文化裏，通識教育往往被視為次等，有關的資源和撥款不足，所以全面推行通識教育並不容易。若要對這些問題作出有效改善，我們認為必須把通識教育融入於大學架構中，讓通識教育成為本科課程不可或缺的部分。

在過去的二十年間，美國加州大學最惹人矚目的其中一項革新是開設了一系列新的行政職位，包括副院長（Vice Provost）、副院長助理（Associate Vice Provost）和教務長（Dean），這些職位專門監督本科課程發展。作為本科教育行政總監（Chief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Officer），他們需要負責處理有關通識教育各範疇的事宜，並使通識教育融入到本科課程的整體。除了剛落成的美熹德校區（Merced Campus）外，所有加州大學校區均有開設此類別職位。各校區的要員會定期開會交流意見，傾談各自所辦的活動，分享當中所遇到的困難等。

我們認為這項進展對強調通識教育的重要性有非常正面的意義。這並非單由大學自行發起，同時亦獲得加州議會及其他專業機構的鼎力支持，因為它們認為加州大學的辦學理念就是為州內的年輕人提供優質的本科教育。除此之外，州政府很欣賞大學院校開辦研究院和其他專業課程所累積的經濟效益及國際聲譽，但同時也指出，這些課程以及大學和院系以專業為本的文化是與本科的教育目標存在著一定的張力。

通識教育委員會的其中一項工作是向每位本科教育行政總監進行詳細和保密的訪談，受訪者中有三位本身就是委員會成員。訪問內容包括他們的職責範圍、在大學行政架構裏的地位、可支配的支援，以及作為行政要員的經驗分享。開設這類別的行政職位有助通識教育的長遠發展，他們肩負著一項重要任務，就是開拓和推動通識教育的創新和變革。在訪問過程中，我們感到非常鼓舞，因為所有行政總監皆完全投入通識教育的使命，並為能改善本科生的學習生活而感到欣慰。他們列舉了不少有關革新通識教育的例子，以助提升本科生的整體生活質素，並為此感到十分驕傲。

是次革新獲得十分正面的回應，但這些職位的設計仍有許多不足之處有待改善，因此我們相信這只是加州大學復興通識教育的第一

步。雖然可能會忽略個別差異和特殊情況，但我們仍然大體總結出下列有關這項革新的局限：

- (一) 不同校區的行政總監所持的職銜各不相同。雖然職銜各異，其實並無不妥，因為這正好反映出每所校區的獨特文化、架構和歷史背景。然而，從大學的整體行政角度而言，這會帶來一定的混亂和不便。
- (二) 各行政總監的實際職責與其職銜一樣變化多端。有些負責監督本科課程的整體規劃，有些則只專注通識教育課程和項目。即使同樣以監督通識教育為主，不同校區的行政總監的職權範疇也迥然有別。當然，我們並非崇尚工作職務單一化，然而這恰反映了這些行政職位與許多原本屬於本科教育（甚至通識教育）範疇的傳統行政架構已逐漸融合，包括處理本科事務的部門，以及其他中央行政要員、院長、主任等職位。
- (三) 在個別校園，行政總監被要求重點推行有關通識教育的變革。與此同時，我們還發現了一個普遍的趨勢，就是行政總監們都需要監察大量日常的例行行政工作。不論是進行中或開發中的活動，他們都需要給予學術意見、審批課程、撰寫課程內容、為課程取得認可作準備，還要舉辦海外交流活動、學術研究項目、暑期進修課程、特別輔導班等，甚至連處理學生紀律問題也在日常的工作範圍內。無可否認，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去嘗試的活動，並可作為推動革新的起始點。不過，由於他們花掉大部分時間處理上述的工作，已再無空間去發掘其他可行的發展路向。因此，他們變成只為完成別人所安排的工作的傀儡，其工作表現亦只為迎合少數人的要求。

- (四) 在某些校園，新行政總監在工作上的行政安排是與其他部門主任一致的，包括向上級匯報、擁有權力和自主性，以及參與校區中央事務。另一邊廂，別的校區行政總監則可以運用本身的影響力去自行決定其部門的運作模式，而非僅靠上級授權。當然，在不同院校中，對權限的界定存在著不少差異和例外。此外，個別行政人員自以為統領了整個校區的教育和課程規劃，於是便對新的本科教育行政總監加以壓制。這種矛盾雖然並未演變成表面衝突，但受訪者卻訴說他們得花上加倍的時間同其他相關部門諮詢、協調、游說，以維繫雙方工作中的夥伴關係。
- (五) 除個別例子外，大部分的行政總監均無靈活的經費，所以他們並不能確保每年有足夠的財政儲備去繼續推行現有的創新課程和改革項目。當中最為人熟悉的特例是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 (Los Angeles Campus)，這個校區於1997年獲得時任校長楊查理 (C. Young) 每年撥款二百萬美元的承諾，用以紓緩各學系開展通識課程的壓力、支援開辦「群組科目」(cluster courses) 和其他通識活動，以及發展新的通識項目。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 (Berkeley Campus) 本來也決定每年撥出六十五萬美元，以進行本科課程試驗和改革，可是隨著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的經濟衰退，這項撥款被終止。普遍而言，這類撥款都是按個別項目來決定，會因應每年財政預算而隨時被中止。
- (六) 在學院的政治環境裏，財政預算與該部門所具的影響力掛鉤。這些新任通識行政總監的經費有限，所以他們需要與大學其他部門的行政主管、財政主管和校外贊助機構維持良好關係，藉以爭取更多經費。這現象正好說明通識教育

一直面對的最大困難。在剛履任時，行政總監們都抱著一股熱誠，堅持自己的理念。但當他們既要向有關部門爭取足夠的財政資源，亦要應付系內教員的不同索求時，便開始失去信心，當初的雄心壯志亦減退。通識教育之所以能在洛杉磯校區取得成功，並成為其他校區持續推行和變革通識教育的模範，主要是因為有大額撥款、校方積極領導，以及校園擁護的氣氛這三方面的支持。

(七) 本科教育行政總監與學系的聯繫一直都受到局限。基本上，學系主任是學系與大學行政主任之間一同處理問題的唯一橋樑。除特例外，本科教育行政總監一般都沒有權力要求學系或學院主任直接向他們匯報。個別行政總監會與學系一直保持友好和互信的關係，然而大多數只會在學系有個別需要時才作磋商。一般而言，雙方之間只有少數的官方途徑去互相溝通。當然其中也有例外，例如，在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校區（San Diego Campus），本科教育行政總監會定期與各學系負責本科課程的副主任會面。在此要強調的一點是，設立這些新行政職位的目的，是為了促使學系內部提出更多意見、建議，甚至不滿。我們希望學系能夠明白溝通是雙向的，而非只由上到下去施政。由於本科教育行政總監在學系架構外所取得的項目和課程十分有限，且不穩定，因此他們必須主動爭取協辦其他不定期的教育項目，或利用獎賞去吸引有興趣的學系來建立合作關係。

(八) 除少數例外，大部分獲學術委員會批准推行的通識教育新政策都適用於整個校園。可是，比起由本科學院或

學科院系所籌辦的學術課程，學系在通識教育所作的系統性跟進和檢討遠達不到基本要求。

通識教育委員會決定為每個校區設立並落實本科教育行政總監的職位，包括專門負責通識教育的人員。委員會並高度肯定各委員為訂定創新和艱鉅的新政策而作出的努力。然而在現階段，我們認為這些新職位仍未能充分發揮最佳效能，若校方能再向前跨進一步的話，必有更大益處。雖然我們也沒有一個確定的答案，但從過去的經驗中得知，校區需按照其獨特的文化背景，才能發展出一套最合適的通識政策。據這一理論，我們提出如下建議：

- (一) 各校區需竭力為本科教育行政總監這項職位重新作出評估和界定，包括他／她在行政架構中的位置、所擁有的權力和需承擔的職責。這項工作應由校長辦公室負責，並擴展到其他部門，如學生事務處、院系、教務處等，因為這些部門的職能與通識教育是相輔相成的，往往與本科教育行政總監所管轄的範疇有重疊。不論是通識教育，還是整體的教育改革都需要在職能和權力兩方面取得一個新的平衡點。若我們藉是次機會來闡明一直含糊未明的行政權責問題，並給予正式授權，相信所有的校區均可得益。
- (二) 即使校區暫時未能完全做到前述建議，這些被重新定位的本科教育行政總監亦應與其他行政要員一樣，成為校長辦公室內閣一員，亦即在大學的中央行政上擔當一定的職能。再者，他們應與教務委員會建立正式和持久的良好關係，參與訂定教育方針。
- (三) 每一位本科教育行政總監應獲分配一筆流動資金，用以推廣其訂立的革新項目。然而，我們並非提議各學系為通識

教育另行設立新的獨立部門，學系應負責統籌所有固定課程，這樣可避免產生資源鬥爭、制度僵化、權力不清等內部危機。我們建議校方可先預留資金，用來推行課程試驗、增聘學系人手，以及繼續推行試驗成功的項目和課程，但經費仍需每年重新作評估和審批。每項通識教育項目的審批應按其年度評估，從而決定是否值得繼續進行，還是被淘汰。

(四) 在缺乏通識教育的校區，我們應加強教務處對通識教育的興趣和參與。另外一點須注意的是，教務處的職責不僅限於課程批核和例行審查，他們應做得更多更廣。雖然我們不確定是否應為每個校區訂立特定目標，但的確有必要為新編寫的通識教育課程作出多次批核和審閱，不論是由本科教育行政總監、院系、還是學系負責進行。為了更有效平衡各方利益和調整改革方向，相關的中央部門應該定期瞭解通識教育對整個校園所產生的影響，而非僅靠委員會作一次性檢討。

(五) 校方應重新考慮如何讓本科生明白有關通識教育的要求和學習機會。學生事務處、本科學院、學科院系之間在這個議題上的輔導角色應做到更加清晰的劃分。我們留意到現時輔導學生選課的方式十分凌亂，大多只關注如何令學生選修的科目能夠滿足畢業要求。這容易導致學生產生錯覺，認為通識教育是強迫性的、不情願的、胡混過去即可。因此，加強通識教育推廣的其中一項要素，是改善學生對通識教育的理解，並且改良學生輔導的模式。

我們希望藉上述建議能改善通識教育的**結構性條件**，從而增加各校區在革新通識教育方面的潛能。我們堅信這些改變是改善通識教育的必要條件。

## 四、通識教育課程改革

在改善了行政架構問題後，我們便應進一步改革課程內容，讓通識教育成為本科教育的必要元素。加州大學在成立通識教育委員會前，曾與二十多位美國其他大學的行政要員作訪談，這些院校主要以公立大學為主，其規模和特色均與加州大學相仿。訪問內容大致圍繞討論通識教育的政策和不同通識教育項目的成果，不論是推行或持續性的項目。雖然訪問結果並不能完全代表整個美國的現狀，但從中歸納出來的共同模式仍有助通識教育委員會於日後釐定工作路向。

首先，幾乎所有大學的通識教育模式都是一致的，那便是先訂定數個學科範圍，例如：自然和生命科學、社會科學、人文學科、藝術文化等。然後在每個範圍內提供一系列不同的科目給學生自由選擇，學生必須在每個範圍內選修一定的學分。這種選修模式被稱之為通識科目「自助餐化」。

第二，大部分院校現正（或剛好完成）為通識教育進行檢討，但結果多只是提出一些漸進的改革建議，屬於小修小補方案。

第三，通識教育的課程改革大致可分為如下四類：

- (一) 強調提供跨學科課程的重要性，但實際運作的模式卻與之存在很大差異。
- (二) 重點加強有關社會變革與社會問題的課程，例如：社會和文化異同、全球化和國際化、環境保護、恐怖主義、現代民主社會在道德和政治的兩難等。
- (三) 基礎能力課程，例如：電腦技能、數理推理及技巧、寫作能力等。
- (四) 培養和訓練批判性思維及邏輯分析的課程。

上述結果均屬意料之內，即使進行全面的詳細研究，我們相信亦會獲得近似結果。顯而易見，對於通識教育的改革，我們仍突破不了原來

的框架。只有少數院校會把通識教育列作整體大學架構的問題，從行政、學系和經費三方面做全盤考慮。我們認為大學必須意識到這個先決條件，才能真正地為通識教育進行徹底和持久的改革。

委員會認為各間大學對課程改革的推動力很強，而且會因應整個社會和世界的變化趨勢而修訂課程，這是值得讚賞的。這些變革的重點也與通識教育的宗旨相吻合。此外，我們認為，即使能夠為各通識範圍訂定一系列適時的科目名單，也不一定比現有所累積的成果好。若我們罔顧高等教育院校本身所具備的獨特背景、特色和地理環境，強行地設定單一的課程模式，則只會帶來潛在的課程危機。

我們將於下文重點討論必修科目與選修科目之間的利弊，以及對推行通識教育所帶來的影響。首先，我們會探討一下通識科目在選科方式上存在的兩個極端，就是「完全必修式」和「完全自由選修式」。前者如：芝加哥大學（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的必修核心課程，它們均為主修以外的科目；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的當代文明科目；加州大學於較早前開辦的美國歷史和憲制科目，其中包括美國史和政治學各一科；加州大學美熹德校區為一年級學生設置的「世界在我家（The World at Home）」核心課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校區其中四個學院開設為期一至兩年的核心課程；近期建成的加州大學美熹德校區所開辦的高年級核心科目（upper-division counterpart）；以及許多其他院校為新生所開設的寫作課程。

在美國絕大多數的高等教育院校，強制所有本科生必須修讀指定科目的日子已成過去。現時，選科「自助餐化」才是主流。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決定取消必修的「美國歷史和憲制」範疇，當其時這個範疇的科目數量已高達九十科。數年後，校長在本科課程增設了「美國文化」範疇，以體現美國多樣化及多元文化的特色。現時，柏克萊的學生只需從約五十科中選修一科便可滿足畢

業要求。另一邊廂，許多學校甚至完全沒有指定要求，學生在每個範疇（一般為三至四個）內的科目選擇是完全自由的，其中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更是選科自助餐化的佼佼者。

學生必須修讀指定和統一科目的趨勢已漸漸式微，原因包括：

（一）大學教育普及化。由於學生人數眾多，若要所有學生在同一時間修讀同一科目似乎不太可能，除非將學生分作小組上課，例如寫作課程的安排。加州大學美熹德校區由於是新建成的校舍，人數較少，所以校方要求新生一起修讀核心課程似乎仍然可行。但長遠而言，當學生人數逐漸增長時，仍會面對一定壓力。

（二）高等教育的其中一個長遠價值取向是尊重學生的個人選擇。

（三）強制修讀某課程內容可能會帶出政治和意識形態的爭議。必修和選修之間的張力，亦可被視為有架構與缺乏架構、自由與限制這兩個層面的角力。有學者甚至諷刺這是一場「不可能的政治任務（principle of political impossibility）」與「鬆散無能的制度（principal of institutional cowardice）」兩個極端間的鬥爭。美國高等教育受到各方面的文化影響而變得既多元又政治敏感，因此若我們要求所有學生都必須修讀統一兼無他選的課程組合，最終只會為課程設計帶來激烈衝突，甚至令發展停滯，或只流於鬆散的妥協。在這樣的環境條件下，自助餐化的選科模式似乎是最簡易的解決方案。因為既不需要考慮學生的入學要求，亦與學生有個人選擇權利的原則相吻合；學系也無須增加額外行政工作，只需按一貫的程序開授合適的科目即可。雖然如此，我們並不能就此斷定「鬆散無能的制度」長遠來說會有絕對的優勢，能夠獲得學生和學系永遠的支持，受到行政人員的歡迎，並藉以減少令人煩厭的長期矛盾和部門間的爭鬥。

委員會一方面不能佯裝這場角力已獲得全面解決，另一方面也不可能時光倒流，回到往日的單一模式去。然而，我們仍抱著為本科生謀福祉的理想，希望利用現有的環境條件找出革新的可行辦法。我們的初步構思是，利用適時的時事議題進一步發展和推廣一系列有結構和跨學科的課程組（collections or packages of courses），例如：環境的可持續性、科技與社會、官僚主義與社會、軍事與社會、生物科技發展的政治和道德矛盾等。每一個課程組可包括數個科目，並加入一些特別元素，例如利用一個學期的時間進行原創性研究。當學生完成一個系列的課程組後，我們可在其成績單上清楚列明，這就像副修科的施行辦法一樣。學生都希望自己在課堂上的努力能獲得正式認可，但以往的成績單一般只會列出其主修科目，由於他們在通識科目的付出不會獲得特別認可，所以通識科目在整個課程結構中經常被標籤為次等科目。因此，若我們把通識教育科目的分數列在學生的成績單上，便有助提升通識教育在整個本科課程的地位和重要性。

此外，若我們把通識科目叢聚成不同系列，通識教育便可成為本科課程中的一個重要部分，就如「套餐」一樣，是缺一不可的，這樣便避免了通識教育淪為整體課程中可隨意搭配的「散餐」菜色，或「自助餐」無數食物中可有可無的一項。學生可自由去選擇修讀哪一個系列的課程，然而一旦作出選擇，便需符合當中涵蓋的所有要求。我們認為這樣的發展模式有助引領有興趣的學生，對跨學科科目的特色和經驗作出更深入和適時的瞭解，這亦符合通識教育的一貫宗旨。通識系列使學生更投入學習通識科目，能獲得正式認可，亦可促進教員們之間的關係。雖然教員任教同一系列的不同科目，但不會被界定為屬於同一部門，有了叢組科目，便有助於強化學系間在知識傳授上的協作關係。

委員會非常鼓勵各校區推行較進取的課程發展策略，這些策略都是於近數十年才提出並累積的，有助於豐富本科生的學習經驗，並進而實踐通識教育理想。我們可特別留意下列已進行或於將來可能進行的教學革新：

- (一) 為一年級和二年級學生開辦時事專題研討班 (seminar)。  
近十五年間，加州大學大力於一、二年級的課程當中增設這種類型的研討班，已成為公立大學制度的一項新里程碑。現時差不多所有校區均有開設此類研討班，這更漸漸成為加州大學校園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然而，學生選科卻仍然是使用「自助餐化」的模式。普遍而言，校方以教員的自主性作主導，讓他們自行決定開授科目的主題和研討的焦點。若我們希望把這類專為一、二年級學生而設的研討班跟通識教育的宗旨拉近的話，其中一個辦法便是鼓勵教員從他們的研究專長中，選擇一些當代的社會問題或政治議題來作為研討班題目。另一個可行的建議是，若教員開辦與某一課程組主題一致的研討班，便適當地給予他們獎勵。
- (二) 基於相關院系講授的是具前瞻性的知識，可考慮發展、設計「制高點科目 (capstone course)」，這會有助於豐富高年級的通識教育課程。
- (三) 鼓勵學系重新整理現存科目或開設新科目，以使學生將所學應用於倫理、道德、政治等範疇。若我們能發動數個學系聯手推行，成效會更佳。這有利於通識教育延伸現時以服務性質為主導的形式，也就是要改變通識教育只為非主修學生提供其他專業知識的形象。

(四) 為本科生提供更多參與研究活動的機會，包括學術、實驗或模擬處境。親身參與研究活動是非常有成效的教育途徑，甚至可以加強教員、研究生及本科生之間的協作關係。

(五) 組織常任教員 (regular faculty)、合約教員 (temporary faculty) 及研究生助教，一同持續進行教學模式的檢討和研究改善的方法。這不但對通識教育，甚至對本科課程整體均有裨益。

上述建議的內容有部分重疊，然而，若我們希望發揮通識教育的最佳價值並拓展其可行性，校方同時推行多方面策略亦未嘗不可。既然我們認同應以「豐富學生的校園生活」作為復興通識教育的宗旨，而非只為滿足畢業的要求，因此，從多方面入手去推行通識教育是最理所當然的策略。

## 五、推動通識教育文化

行政架構和課程方面的改革對推行通識教育當然十分重要，然而這只是實踐的手段。若我們希望有效地推動通識教育，便必須從改善文化入手，將通識教育理念潛移默化於整個校園的各類群眾中。

早於二十世紀初，大學院校已開始蘊釀發展通識教育課程，用以抗衡專科化及多元化的弊端，並為這些弊端所產生的負面影響作出補救。基於高等教育專科化和學生選科自由化的趨勢愈來愈普遍，通識教育的倡導者希望復興「全才」的教育取向，為學生灌輸「更高」的價值觀念和知識技能，高等教育不應只停留在為學生增強將來的工作前途和賺錢能力的層次。這種崇高的理念迅速獲得各方的回應以示支持，許多教育工作者致力於宣揚通識教育理念，撰寫了不少筆墨有力

的學術文章以肯定通識教育的價值。可惜在實際推行方面，我們仍面對一場艱巨的戰爭。

普遍而言，學生對於通識教育可謂一知半解，更莫說當中的價值意義。他們大都認為高等教育的目的是提升職業技能，只有少數人期望大學生活可幫助他們發展文化修養、道德觀念或政治取向等。學生不了解通識教育的宗旨是無可厚非的，他們只視通識教育為中學課程的延伸，有「避之則吉」的想法。若我們期望學生能在短時間內改變這一根深蒂固的想法，是不切實際的。我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若校方不提出全校性的方針，最終甚麼也不會改變。

在校園內推動通識教育文化是可行的一個辦法，然而沒有任何建議能有絕對的保證。我們的著眼點是，將在推行通識教育時可能遇到的嚴重結構性障礙作出分析。我們不應奢求一瞬間就能把通識教育點石成金，相反，我們希望能藉著不同途徑去推廣通識教育，達到漸見成效。

### (一) 教員

教員任教通識科目一般都不會獲得額外的實質回報，然而按個別大學本身的文化和經濟狀況，這還是存在一定的差異。由於學系的人手調配很大程度上是與收生人數有直接關聯，因此一些收生率不高的學系，尤其是人文學科，會因為主修學生人數不多而需要開辦一些受歡迎的通識科目自救。由於教師職位的數量很大程度是與學系收生規模直接相關，所以每當僱用新的教員，學系之間便會互相比較，學系招聘愈多人手，即代表該學系發展得愈成功。雖然人數眾多的學系的工作環境不一定比規模小的學系優勝，但陣容鼎盛的學系的內部士氣一般都較高昂。這風氣促使收生率低的學系開辦通識科目。雖然如此，開授通識科目的集體得益卻不完全等同於個別教員的理念，一些教員仍然寧可選擇任教高年級主修科目，或為研究生開設研討班。

那麼，我們該如何鼓勵教員任教通識科目呢？

1. 其中一個方法是向任教通識科目的教員提供經濟資助。在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校區，若教員任教學院專為一年級學生開辦的核心課程，他們可以獲得適度的撥款，以作為開展該科目所需的研究經費。如該科目繼續開辦，則每次均可獲得額外款項，但數額自然比開設新科目為少。此外，加州大學各分校的所有教員若任教新生研討班，均可獲發一千五百美元的研究撥款。撥款的金額顯然不算多，若能調高的話，其吸引力自然會大增。
2. 調低教員的整體教學時間和工作量，作為他們任教通識科目的補償。在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校區，化學系的教員若任教人數多的基礎班或入門班，不論學生是否主修，均可獲額外教時補償，以表示對他們工作的認可。
3. 教員在教授通識科目時，可得到教學上的支援。在某些院校，各學系有專門負責通識科目的辦公室職員，為教員提供支援服務，如書籍訂購、影印教材、更新科目網頁內容，甚至聘請助教等。
4. 校方亦可通過具權威性的途徑表揚稱職的教員，以作為精神上的鼓勵。學校有否推行全校性的教學獎？這類獎項一般都由那些任教受學生歡迎的基礎班或通識科的教員獲得。學校有否正式的頒獎禮？校董、校監、校長等會否出席頒獎禮，甚至為頒獎禮致辭？大學主管人員、傑出畢業生、或者重要捐款人有否特別強調通識教育的價值？若我們能邀請一些在通識教育方面德高望重的學者為我們打氣，這絕對有助提升通識科教員的士氣。

只靠外在獎賞，不足以推動通識教育的普及。許多教員因任教通

識科目而感到無比滿足，因為他們需要採取與本專業不同的方式去處理教學材料，這是一件很有挑戰性、啟發性和有滿足感的事情。不少教員亦很珍惜與其他學系同工合作的機會。在入門班上擴闊了學生在陌生範疇的眼界，並增加他們於不同層面的興趣，教員可從中感受到成功感和滿足感。這些都是非常重要卻往往被人忽略的推動力。在研究型大學裏，教員在專業研究和研究院教學兩方面，無疑承受著很大壓力，因此，若校方能提供經濟或精神上的支持，對減輕教員的工作壓力會有一定的幫助。

## (二) 研究生

在大多數研究型大學裏，本科生第一位（甚至是唯一一位）接觸及認識的導師便是研究生，然而這種關係往往很弔詭。當一位研究生愈加專注於其專業研究，並發展出一套獨特的語言、文化和論題的時候，同儕和導師們便對這位研究生更信服，最終他便能更成功地發展其學術事業。因此，優秀的研究生一般都不會被安排處理教務，更莫說是為沒有打算繼續升讀研究院的本科生當導師。在如此氣氛下，本科生又怎能從教導他們的研究生身上學懂欣賞通識教育的價值？作為現時及未來的導師，若研究生自己都不認同通識教育文化，通識教育又怎能自強呢？研究生往往被調派去任教通識科目，因此，研究生與其他全職教員一樣需要外在的獎賞以鼓勵他們在這方面的付出。我們亦可舉辦一些週年晚會或有關通識教育意義的座談會，甚至邀請海外的著名學者來校演說，這都有助於通識教育受到認可與接受。

有些大學（包括加州大學）為研究生開辦改善教學技能的課程，並為他們提供不同程度的指導及支援。可惜的是，那些作為前線導師的研究生中，多數人認為教學培訓和支援仍十分貧乏。因此，除了要加強研究生的通識教育文化，我們更應著力發展他們在教學方面的技能。

### （三）非常任或兼職教員（non-ladder and part-time faculty）

在許多院校裏，大部分任教通識科目的教員都並非非常任，甚至是兼職的職位。不論書院或大學都愈來愈依賴這類非常任導師，甚至游說工會使大家漸漸接受這種固定合約的聘任模式，卻沒有為這些導師爭取正式融入校園的權益。我們強烈要求院校為非常任教員訂定相關的員工發展政策及計劃。計劃可包括邀請（而非強迫）合約教員參與對高等教育目標和機會的討論，出席學術報告會、研討會，以及其他推廣通識教育的活動。合約教員不論與學系、還是校園的聯繫一般都很疏離，這種被邊緣化的現象十分普遍，並會引致整體士氣低落。若聘請合約員工的學系能多作出安排，從學術知識、工作環境、人際社交三個層面上協助他們更有效且緊密地融入學系的大家庭，這對加強合約員工的士氣有莫大的幫助。此外，合約員工亦應有資格與常任教員一同競逐模範教學獎。

### （四）輔導員（advising staff）

在規模較小的院校，學生輔導工作一般都由教員自行處理；較大型的院校則通常會安排一位受過專業訓練的教員負責。大體上，學生輔導工作與學系、以至院校層面的決策有關，所以往往亦牽涉到不擔任教學任務的行政人員。這些行政人員會被委派完成大量有關輔導方面的工作。原則上，他們也是受學系主任和委員監督的。

為學生作輔導的教員常常被學生的需求弄得不勝負荷，這是由於他們本身對通識教育不算十分熟悉，若我們要求他們變成這方面的專家，也是不切實際的。較可行的一個辦法是邀請校內通識教育專家，每年為負責顧問工作的同工發表演說或舉辦工作坊，主題如「教育的目標」、「過去與現在的課程發展」、「通識教育的意義」等。這類工作坊有助確認並提醒他們在本科教育中所擔當的重要角色，這或許是

他們在日常的工作環境中幾乎不會意識到的宏觀理念。除了讓他們能更瞭解通識教育的目標和價值，他們需透徹知曉校方推行通識教育的立場及實際可運用的資源。這能使負責顧問工作的教員更有效地加強通識教育資訊的流通。

### (五) 本科生

部分學生在修讀通識科目時，可能已開始認同開辦通識教育的目的，也有可能在其畢業後才能感受到箇中真意。可悲的是，學生普遍認為通識科目是妨礙他們發展專業技能的絆腳石。美國本土的研究指出，愈來愈多學生認為升讀大學是基於經濟方面的考慮。在1971年，只有37%的新生認為「經濟上將會變得富有」是升讀大學必需或非常重要的原因。然而，到了2001年，這個百分比已飆升至74%。認同升讀大學的目標是「獲得全面的教育及懂得明辨是非」的百分比則一直在穩定的水平，1971年有64%的新生把這項列為必需或重要，2001年則保持為66%。然而，若同經濟和事業的發展相比，這項全面教育的理念可謂是不進則退了。雖然仍有不少學生認同這一理念，但是相比起以前的社會，現在的學生在經濟及事業發展上面對的壓力的確比較大，因此，推行通識教育勢必會比以前的年代更為困難。

要讓本科生明白通識教育的價值，最簡單直接的方法便是要他們發自內心地提出這種訴求。在討論的過程中，我們不應讓學生把討論的核心變成對必修科的不滿，以及投訴強迫修讀通識的要求。反之，我們應該引導學生瞭解在其他非必修的不同科目、課程和活動中，其實都含有通識教育的元素。此外，若大學採用我們之前的建議，將通識科目分成不同的課程組，當學生完成整個課程組的通識科目後，學業成績將列於成績單上，這將有助加強學生對通識科目的認可。

## （六）家長

許多加州大學的學生家長沒有受過高等教育。不少入讀加州大學的學生是外地移民，或他們的父母是第一代移民。這些學生往往較重視升讀大學所帶來的經濟效益，這或許是受了父母的薰陶影響。另一方面，即使父母雙方都受過專上教育，也不代表他們認同當年自己作為學生所奉行的通識教育價值。那麼，校方應如何與家長溝通以改變這種思維呢？最關鍵的還是校方也認同這方面的需要，其中最有效的辦法是讓家長參與新生的迎新介紹和活動。

## （七）校長、校監

校長和校監所承擔的一項最重要任務是與其他高等教育官員保持緊密聯繫，洽談並喚起高等教育的意義。沒有誰比校長和校監親口道出院校的立場和期望來得更重要。因為校長和校監需處理的事務實在太多太廣，他們很可能會遺忘通識教育在本科教育中所擔任的重要角色，因此，本科教育行政總監必須成為校長室內閣的一員，以便常常提醒校長們，他們是推動通識文化的先鋒。通識文化由學系、教員、畢業生、本科生、家長等各方面同心協力才能建立起來，所以我們必須與各方作定期溝通，讓他們明白、認同、並支持通識教育的理念。在實際推行方面，我們應儘量善用物質支援、同儕認可、甚至具象徵意義的獎賞等辦法，作為推動通識教育的回報。校長的角色最關鍵，他們需要組織和召集學校上下對通識教育的關注、宣揚共同的價值理念、並引導學校的道德價值方向。就好似教會一樣，週日佈道並非通過一門「課堂」讓信眾知道一些他們不懂的事情，佈道的目的是在喚醒信眾自身的行為，並從另一個角度去重新演繹、重新聚焦，從而獲得啟發。教會中最具影響力的自然是牧師，同樣道理，校園內能做到同樣成效的便只有校長和校監了。

## (八) 校友

校友也能成為倡導大學通識教育的一份子。許多校友都認為大學生活擴闊了他們的眼界，讓他們成為「世界」的一員，而不僅是城鎮裏的一名小市民。回溯讀書時的經驗，他們認為大學不僅提供職業訓練，當中的通識教育更是畢生受用。這份對通識教育的認同感是值得我們去宣揚的，若我們能邀請校友回校，與學生親身分享這些寶貴的經驗，便更具說服力。學生發展處應留意畢業生對母校的支持並不局限於研究工作或校園發展，他們對通識教育亦可能感興趣。

## 六、通識教育課程和科目評核

在這章節，我們將探討有關課程評核方面的問題。從加州大學對通識教育理念的轉變過程中，我們很清楚地認識到，在現時的新紀元裏，高等院校必須回應社會於不同層面的問責壓力。在美國本土，公立院校和州際的教育系統在反思高等教育制度這方面的意念是一致的，就是必須循不同途徑改善教學模式，同時增加對學生評核的透明度。

研究高等教育的學者設計了各式各樣的調查工具，以深入瞭解本科教育的成效。可惜不同學者對通識教育應取得的成果和量度指標仍未達成共識，所以這些調查工具存在不少混亂和爭議。除了內在的量度困難外，由於不同院校、或同一院校於不同時間所使用的評核方式也有差異，所以要綜合這些數據資料作比較並非易事。另一個困難是許多院校本身並無足夠資源收集所有在籍學生的資料，因此只能把焦點放在對校友的研究上。

我們尚未打算討論整個本科教育的評核模式，本節的重點是探討哪些通識教育的評核方法是可行的。基本上，評核通識科目並不太困

難，我們可以先從學生學習和發展兩方面為每門通識科目訂下明確目標，並按這些目標設定不同的指標作為量度標準。在實際執行時當然會遇到困難，因此我們提議從準備和成效兩方面入手處理。「準備」的指標可包括教學時數、辦公時數、學生學習時數等，這些有助我們從行政的角度獲得概括性的瞭解，然而對實際的教育成效和質素卻無太大幫助。「成效」的指標，顧名思義就是量度通識教育的實質影響，所以較為實用。

在量度成效時，我們既要達到科學的精確性，更要保證所量度的是教育經驗而非其他範疇的實踐，這是十分困難的。例如，以學生的積分點來量度教育經驗質素是不妥當的，因為積分點只能反映學生是否熟讀了教材。從學生自行填寫的課程意見調查問卷中，我們可以知道個別教員的受歡迎程度和該科目的難易程度等，但這與實際的教學質素並無必然聯繫。最後，不論任何情況，所有學生在修讀某一科目時，其實正經歷著許多其他經驗，包括修讀其他的科目、參與課外活動、以至朋友之間的影響等。

事實上，若學生能在短短數年的本科生活中迅速達至個人成長，這絕對比在某一通識科目收穫的成效來得重要。要是我們必須從單一科目或課程中隔離出其獨一的成效以作為評核標準的話，設計的過程必定非常複雜，我們需要加倍小心設計量度的指標、計算量度誤差、還需試用不同方法才能篩選出這些獨一成效。換言之，這好比精確的臨床試驗，因此，要達到如此全面的設計並取得絕對可靠的結果，是十分費力和昂貴的。

鑒於上述的考慮，我們必須在完全放棄評核與進行徹底的定量分析兩者之間取一個平衡點。我們強烈建議各校區先擬定通識教育科目成效的基礎，包括為每科通識教育科目和課程釐定下列項目：

- (一) 學生修讀通識科目的學習目的；
- (二) 展示指定閱讀材料和其他學習資源與該科的學習目的之間的關聯；
- (三) 在科目完結前向教員和學生分別進行意見調查，以瞭解學習的目的是否達到。

上述的建議一方面可作為質素保證的工具，另一方面亦可用來作為收集導師及負責監督通識課程人員意見的途徑。除此之外，我們建議邀請校外評審來作定期評核，這跟研究院課程的做法十分類似，部分加州大學校區已開始實行類似措施。最後，縱使學生的記憶會失真、對往事的回憶亦可能帶有主觀情感，但我們相信瞭解校友在大學生活的通識教育經驗對現時生活的意義和影響，也是非常有價值的。我們建議以追蹤調查的形式，在學生畢業後的不同時段作訪問，例如每隔數年或十年。

## 七、結語

綜合各校區的經驗，美國加州大學通識教育委員會共總結出八項建議，藉以指引美國加州大學的通識教育發展，同時亦為美國其他公立和私立大學提供參考。以下首五項建議與通識教育融入大學架構、課程革新、推動通識教育文化、以及課程評核相關，這些部分已在是次翻譯中論及。第六至八項建議則為原文其他章節所涵蓋的內容，主要針對美國特殊背景而提出，包括通識教育的公民教育意義、轉校生和學分轉換的問題，以及新資訊科技的應用。

- (一) 各校區實踐通識教育理念的方式需被系統化，其要點之一即重新確定本科教育行政總監的角色，並擴展其職能。以

下三點需特別留意：首先，本科教育行政總監應成為大學行政決策核心的一員，他們的意見和角色應被高度重視；第二，他們應每年無條件獲分配充裕的資源和撥款，用以推動通識教育課程和科目發展；第三，應儘可能地減少他們的常規性、繁瑣性行政事務，從而令他們能夠有效地將更多時間用於課程改革、發展和創新。

- (二) 校方應將為教師提供獎勵機制置於重要位置，藉以鼓勵老師投入通識教學，改變他們不願任教通識科的現狀。
- (三) 為解決通識教育選科自助餐化的問題，即學生從數目繁多的通識科目中自行選科的模式，建議校方可按個別適時的議題訂定一系列有修讀次序的課程，或把通識科目組成不同主題的跨學科課程組。此外，這些通識課程組亦可作為副修科的一種，獲得正式的學術認可，科目成績可列在學生的成績單上。學生可自由選修任何一個課程組，但一旦選擇了，他們就必須完成整個課程組的科目要求。
- (四) 不論是大學行政人員還是教員，他們都應該主動和持續不斷地運用其影響力，在校園不同層面推廣通識教育的價值、理念和目標，讓大學上下各類人群都能清楚知道通識教育的重要性和發展機會。此外，學術事務處（Academic Affairs Office）和學生事務處（Student Affairs Office）亦需積極協助轉校生融入校園生活，為他們開辦特別課程（例如一個單元的新生研討班）。
- (五) 在質素保證方面，校方應：
  1. 在教務會（Academic Senate）中設立專門委員會，對通識教育科目、項目或試驗計劃的成效作量度、監察和檢討；
  2. 各位負責設計或任

教通識科目的老師需要向校方提供明確的教學目標、實現目標的具體教學方法，並定期接受校內外評審。

- (六) 加強公民教育和培養本科生的公民參與意識應是高等學府最首要的任務之一。在設計通識教育課程時，我們可拓展和加強以下元素：1. 鼓勵學生參與義工服務和政治性的活動；2. 講授公民教育的學術意義和公民參與的重要性；3. 通過個人或小組探究的教學方式令學生參與社區服務。
- (七) 加州大學各校區應重新評估轉校生的通識課程學分和其學習狀況。各校區應與高中、社區書院及其他州立大學緊密合作，並達成共識，既要確保轉校學生接受通識教育的完整性，亦要幫助他們獲得最佳和最有效的學習，尤其是若學生在原本的院校只修讀了部分通識課程的話，校方更要給予特別關注。
- (八) 大學行政人員和教員應好好應用新的資訊媒體技術，藉以改善教與學的質素，擅於利用較低的成本增加院校與外界的交流。此外，行政人員應確保在利用新科技的同時教學質素並未因此下降。

